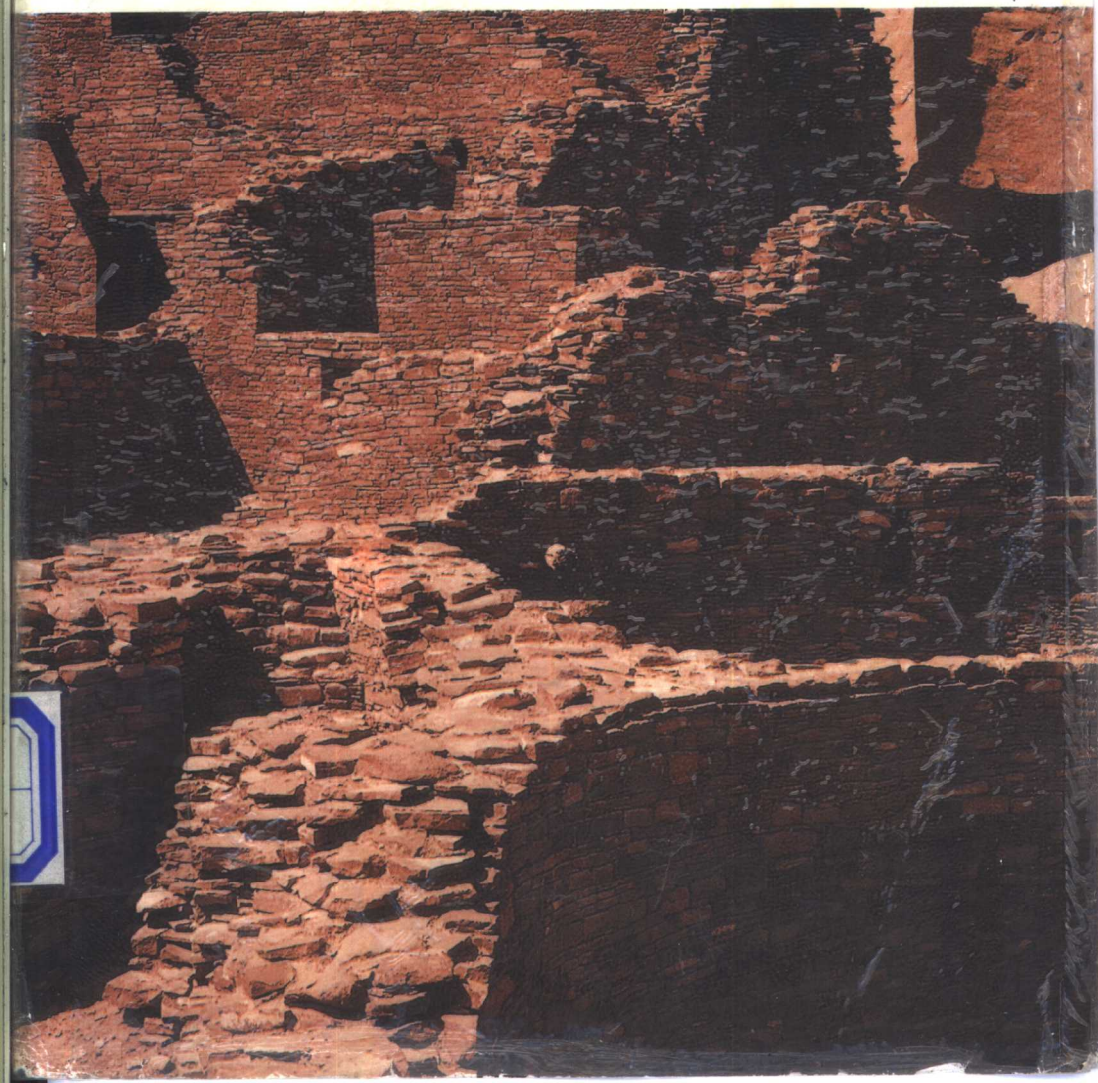


王充闾 著

# 沧桑无语

文化大散文系列



王充闾 著  
**沧桑无语**

东方出版中心

---

##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

沧桑无语

王充闾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20千字 插页5

版次:1999年7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19,001—23,000

---

ISBN 7-80627-446-4/I·148

定价:19.00元

---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王充闾近年来踏访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古城遗迹之后,结合对社会、人生体悟而创作的系列散文结集。

全书以雄浑沉着的绘景笔致,开掘山水之间的历史意蕴,将零编片简、断瓦残碑装订成新的史册;在敏锐的思辨之中,以冷隽深邃的史家目光审视存在的价值,诠释人生哲理意趣,体验审美情境。其中,《青山魂》从李白不乏坎坷蹭蹬的生平经历出发,品评其上的性格与当时社会的严重错位,梳理出主人公内在的精神资源;《陈桥崖海须臾事》通过对历史名都开封的关注,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一系列感慨:永恒与有限、存在与虚无、幻灭与成功、苦难与辉煌,赋予废墟文化特殊的内涵;《文明的征服》则把笔墨洒向金宋两国长时间的较量之上,将文化交流这一史家鲜有论及的话题展露得具体而充分,艺术地传达出作者于国家民族间军事力量与文明程度孰为本质意义的真切认识。此外,《梦寻》、《雪域情缘》、《弦歌中的史记》等视角独特,见解非凡,同样给人以动心动容的丰富感受。

全书注重诗性、理趣与历史感的有机结合,充溢着作者对人类命运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感喟与关切,思想性与学术性兼备。在千年交替的当口,无疑这对于面临种种困惑的人们,具有深刻的启发和鉴照意义。

## 目 录

青山魂 .....	1
寂寞濠梁 .....	21
桐江波上一丝风 .....	39
春梦留痕 .....	64
梦寻 .....	81
叩问沧桑 .....	100
邯郸道上 .....	120
陈桥崖海须臾事 .....	136
文明的征服 .....	154
“无字碑” .....	172
雪域情缘 .....	188
土囊吟 .....	210
狮山史影 .....	226
劫后遗珠 .....	245
弦歌中的史记 .....	259

**附录**

一位散文作家的历史情怀

——答某报记者丁宗皓问 ..... 290

# 青 山 魂

—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蹶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断的源泉。

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欢苦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

的心态,呈现出带有普遍性的“士”的性格与命运的悲剧。

## 二

去年秋末,我有皖南之行,半月时间,足迹遍于当涂、宣城、秋浦(今属贵池)、泾县一带。这里恰好是李白晚年活动的中心。此行为我深入探究这位大诗人的奥蕴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野,理想的角度。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其先祖于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唐时在安西都护府辖区内),五岁前后随父亲内迁至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属四川江油县)。这种丰富的阅历,为他形成创造性思维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盛唐时期繁荣、安定的社会环境,又使他有条件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李白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泛,“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并和善谈“纵横术”的赵蕤等一班人交游,从小便树立了建功立业,“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他常常自比于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晏婴、张良、诸葛亮、谢安,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二十五岁那年,怀抱“四方之志”,出蜀远游,开始了后来三十几年的漂泊生涯。先后曾寓居湖广的安陆、山东的任城,并漫游了祖国东部的许多地方,结交各方面人士,向一些地方官员锐身自荐。尔后,又移家皖南,并终老于此,前后大约住了六年时间。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春,李白从东鲁南下来到皖南的南陵,秋天离开这里奉诏赴京。这是首次入皖。天宝六载,也就是在长安遭受挫折、被迫出京三年之后,又经由扬州、金陵溯江而上,畅游皖南的当涂。又过了六年,李白第三次前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及皖南各县。李白第四次流寓皖南,是在生命



的最后两年，夜郎流放遇赦之后，他再次来到宣城、泾县，最后投靠族叔李阳冰，定居于当涂，并选择“谢家青山”作为埋骨之地。

皖南一带绮丽的风光，朴厚的民情，润滋与抚慰了他的充满动荡、溢满忧愤、布满坎坷的失意生涯。诗人同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而原本就雄奇秀丽的皖南山水，一经诗人的大笔淋漓的点染，更凸现出了它的壮美无俦的神采，成为神州大地最具人文价值的区域之一。

### 三

那些天，我一直沉醉在一种幻觉里：山程水驿，雨夜霜晨，每时每地，都仿佛感到诗人李白伴随于前后左右，而且不时地发出动人的歌吟。当我站在宣城陵阳山谢公楼的遗址上，面对着晚秋的江城画色，“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谪仙名句，油然浮荡在耳际。而当驻足采石矶头，沉浸在横江雪浪的壮观里，“惊波一起三山动”，“涛似连山喷雪来”的隽永，又使我同诗人一样跃动着猛撞心扉的惊喜，获得一种甘美无比的艺术享受。

碧山，坐落在皖南黟县的西北面，它北连孟山，南对霭峰，风景十分幽美。《徽州府志》记载，此地有十里桃花，春时与绿树交映，秀色宜人。虽然我来时已是黄叶飘飞，秋光照眼，但从李白《山中问答》诗中仍能领略它的浓春逸趣。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人眼中的碧山，充满了清幽、纯净之美，是名利场、是非窝的“人间”所无可比拟的。寥寥数语，寓沉重于闲适，寄托了诗人愤

世嫉俗的万千感慨。明代诗人李东阳说它“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其旨趣“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在这里，我也效仿李白以恬淡、虚空的心境，对碧山这个客体作一番美的观照，沉浸在美学家所说的“静照”境界里：“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宗白华：《美学散步》）。

我很喜欢踏着晚秋的黄叶，徜徉于五松山下、天柱峰前，漫步在桃潭、秋浦之间，寻几分天籁，握一把苍凉，在疑幻疑真的朦胧意象里，借助那一泓澄碧和万壑松吟来濯心、洗耳，冲破时空的限界，纵身千载之上，同诗人一道亲炙那“扫石待归月”，“倚树听流泉”的幽情雅趣。

也是在采石矶头，也是那样一个“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的夜晚，我站在拔江而起、危矶如削的峭壁上，望着涛惊浪涌的滚滚江流，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谪仙泛舟赏月图》。李白和他的好友、“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一舟容与，溯流而上，“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河”。像诗人汪静之所描写的，他穿一件极美丽的五云裘，颜色好像夏天的朝云，春天的彩虹，像碧海衬着远山，红霞映着绿草，端坐在船的正中。金樽邀月，诗酒唱和，岸旁观者如堵，而诗仙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

《侯鯖录》载：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板。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答复是：“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又问：“以何物为饵？”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宰相闻之悚然。这虽然只是传说，未足凭信，但确也深得太白的神韵，真实地刻画了他的高蹈、超拔的精神世界。

## 四

李白的精神风貌及其诗文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哺育的结晶。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他是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太白飘逸绝尘、驱遣万象的诗风，显然导源于《庄子》和《离骚》。单就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来看，屈原的热爱祖国，憎恨黑暗腐朽势力，积极要求参与政治活动、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庄周的浮云富贵、藐视权豪，摆脱传统束缚、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对李白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除了儒家、道家这两种主导因素，在李白身上，游侠、神仙、佛禅的影子也同时存在。

本来，唐代以前，儒家、道家、佛禅以及神仙、游侠等方面的文化，均已陆续出现，并且逐渐臻于成熟；但是，很少有哪一个诗人能将它们交融互汇于个人的整个生活。只有李白，这位一生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伟大诗人，完成了这种文化的综合融汇工作，将它们集于一身（参见庞朴、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当然，这里也映现了盛唐文明涵融万汇、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和时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魏晋风度”一样，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气度，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五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李白有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的诗句,就断定他并不看重立言,但比较起来,在“三不朽”中,他所奉为人生至上的、兢兢以求的,确确实实还是立德与立功。既然如此,那他为了实现创制垂法、惠泽无穷的立德,实现拯厄除难、行济百世的立功,就要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首要的是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

因此,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踞高位。但这个愿望,对他来说,不过是甜蜜蜜的梦想,始终未曾付诸实践。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自负其长才异质相关联,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拳拳服膺,倾心仰慕,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君臣合契,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地歆羨。

他确信,只要得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经邦济世、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他的这些宏伟抱负,多半是基于情感的体验,而缺乏切合实际的具体构想;并且,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也缺乏透彻的认识,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 六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天宝元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举荐，下诏征召李白入京。这年他四十二岁。当时住在南陵的一个山村里，接到喜讯后，烹鸡置酒，高歌取醉，乐不可支。告别儿女时，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

原来，这时的玄宗在位已三十年，腐朽昏庸，纵情声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这使李白感到万分失望。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忍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脚色呢？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只好上疏请归，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时，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诏，以第十六子李璣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璣，招募将士数万人，以准备抗敌、平定“安史之乱”为号召，率师东下，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对于国家颠危破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恰在此时，永王李璣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诗人认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扬志气，充满了“欲仰以立事”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

来。”以为靖难杀敌、重整金瓯非永王莫属。

哪里料到，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为时不足三个月。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但李白是既不认输也不死心的，总想找个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六十一岁这年，他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定居于采石矶。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消息，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书军中，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无奈中途病还，未偿所愿。

## 七

表面上看，李白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观因素，颇带偶然性质；实际上，其性格、气质、识见才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事、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关于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论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玄宗召李白入京，最初很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发现他“非廊庙材”，便只对其文学才能感兴趣。所以后来他要求离开，玄宗也并不着意挽留。这是说，李白并不是摆弄政治的材料。另一种认为，李白看错了人。本来，唐玄宗已不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而李白却仍然对他寄予莫大希望，最后当然要落空

了。这又说明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可以说,两种意见是殊途而同归。

关于李白“从璘”的教训,论者一致认为,他对“安史之乱”中的全国政局看得过分严重。他在诗中写道:“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三川北虜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显然是违反实际的。由于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行动上必然举措失当。在他看来,唐王朝应急之策是退保东南半壁江山,而永王正好陈兵长江下游,因而稳操胜券。这是他毅然“从璘”的真正原因所在。应该说,在李璘身上,他又一次犯下了不知人的错误,既未发觉其拥兵自重、意在割据的野心,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见识短浅,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报国的希望寄托于这种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高自期许,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不善于审时度势,疏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其后果如何,不问可知。对此,宋人王安石、苏辙、陆游、罗大经都曾有所论列。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 八

我以为,这种现象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席不暇暖,在别人看来无法实现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人格精神对于后世

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比起李白来，杜甫更要典型一些。他深受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对于这位精通战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自齐鲁至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自己不忘这位远祖的勋绩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雄心。尔后，便来到京城长安，开始了十年困守的生涯，无非是为了“立登要路津”，“欲陈济世策”。他曾分别向玄宗驸马张洎、奸相杨国忠的红人京兆尹鲜于仲通、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等一班权贵投诗干谒，请求汲引。但这也同李白一样，最后都以失望告终。

总共算起来，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卑职小。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刻板、认真，恪尽职守，绝不怠慢从事。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他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坚持任人以贤、惟才是用的标准，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的道理，最后险致杀身之祸，由于宰相大力援救，遭贬了事。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

可是，四百年后的陆游却为之大鸣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  
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由于政坛失意，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



杜甫、对许许多多诗人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 九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

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重视生命个体的外向膨胀，建立了一种志在牢笼万有的主体意识，总要做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人。

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主君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